

# 第一章 现代日本经济的起点 ——从崩溃到重建

## 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状态

### 1. 战败和经济危机

四十多年前的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成为现代日本经济的直接肇端。靠明治维新而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一员的日本，在促进近代工业发达的同时，经历了诸如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吞并朝鲜、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战争、占领法属印度支那<sup>①</sup>等一系列的战争和对别国领土的侵略，屡次取得胜利并获取了大量的战利品和赔款，迅速成了富裕国家。

最终，日本与德国、意大利这两个法西斯国家结成了防共同盟，于 1941 年 12 月 8 日正式绑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车。防共同盟实际上是少数专制主义国家以消灭共产主义为幌子而企图征服世界的组织，是与世界各民族自由、平等、民主主义原则相背离的。因而，日、德、意三个轴心国与整个世界民主势力为敌的结果是，损兵折将，经过四年的苟延残喘后，不得不向同盟国军队宣布无条件投降。而“现代日本”正发端于此。

中日甲午战争发生于 1894—1895 年，日俄战争发生于 1904—1905 年。吞并朝鲜发生于 1910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于 1914—1918 年，1914 年日本参战。中日战争开始于 1931 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满洲事变，1937 年发生的“上海事变”使战火蔓延到中国的东部和南部，日本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发生于 1940 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给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邻国带来了触目惊心的人力、物力方面的损失，同时，日本国民也深受战争之害。不仅有很多士兵在战场上战死或病死，而且由于美国 B29 轰炸机的狂轰滥炸、军舰炮击、向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等原因，也造成了国民的大量伤亡。据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死亡 255 万人（其中军人、随军家属 186 万人，一般国民 69 万人），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都被燃烧弹烧毁，四分之一的国民财富（按 1945 年价格计算 653 亿多日元化为乌有见第 1 表）。

许多在主要军需工厂工作的工人随着战败而被解雇，加上大批复员军人和海外归国人员，没有工作可做的人达 1300 万。大批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充斥着街头巷尾。粮食饥荒蔓延，很多人因营养失调而死——这就是战败后日本的悲惨景象。

我们再来看看战争结束后第二年——1946 年的工矿业生产指数。如果将战前水平（1934—1936 年平均值）作为 100，那么 1946 年则降为仅有 30.7，只是战时生产最高值的 1944 年指数 178.8 的六分之一，真可谓是名副其实的毁灭性打击（第 2 表），仅相当于战前水平 30.7% 的这一指数与德国并列为世界最低水准（与此相反，美国通过战争，工矿业生产指数大约膨胀了 1.5 倍）。

实际上，这时的日本国民因深刻的粮食短缺、住房不足、物资匮乏而在苦苦挣扎，那些只身逃回的海外归国人员以及城市空袭罹难者的境况更加悲惨。人们栖身于由布满燃烧痕迹的白铁皮和废弃材料搭建的简易棚中。由于缺乏衣服和肥皂，身上长满了虱子。他们相互抢夺食物，并由此而引起了人们之间的相互仇视和不和。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些现在无法想象的惨不忍睹的现象不断发生。这样，由军阀、财阀发动的这场缺乏思考的不负责任的侵略战争，不仅使日本国民大众生活的家园被战火烧毁，失去了家庭，而且被推入了地狱般的饥饿之中，有时甚至顾不上为死者祈祷冥福。

第1表 国民财富的损失额和战争结束时国民财富余额

	国民财富 损失额 (A)	停战时 剩余 国民财富 (B)	上 合 计 (A+B)	损失率 $\left(\frac{A}{A+B}\right)$ %	按停战时价格 换算昭和10年* 的国民财富余额 (C)	停战时国民财 富余额与昭和 10年的比较 (B/C) %
	百万日元	百万日元	百万日元		百万日元	
总额	64,278	188,852	253,130	25.4	186,751	101.1
建筑物	22,320	68,215	90,435	24.6	76,275	89.4
港湾	132	1,632	1,764	7.5	1,323	123.3
桥梁	106	2,773	2,875	3.5	2,288	121.2
机械	7,994	15,352	23,346	34.3	8,501	180.6
农机	884	11,618	12,502	7.0	10,903	106.6
车辆	639	2,274	2,913	21.9	2,461	92.4
船舶	7,359	1,766	9,125	80.6	3,111	56.8
电力煤气供应设施	1,618	13,313	14,931	10.8	8,987	148.1
电信电话广播设施	293	1,683	1,976	14.8	1,537	109.9
自来水处理设施	366	1,814	2,180	16.8	1,698	106.8
储藏物	17,493	63,448	80,941	21.6	67,085	94.6
杂类	1,243	4,964	6,207	20.0	2,608	190.3
难以分类物品	3,936	—	3,936	100.0	—	—

资料来源：经济企划厅《战后经济史(综览篇)》1957年，第11页。

\* 昭和10年为1935年。

第 2 表 工矿业生产指数 (1934—1955 年)  
(1934—1936 年平均为 100)

年 度	指 数	年 度	指 数	
1934	89.8	停战	1945	60.2
1935	99.0	战	1946	30.7
1936	110.5	后	1947	37.4
1937	129.7	的	1948	54.6
1938	142.4	机	1949	71.0
1939	147.8	朝	1950	83.6
1940	148.8	鲜	1951	114.4
1941	149.6	战	1952	126.4
1942	144.5	争	1953	155.1
1943	160.1		1954	166.9
1944	178.8		1955	180.7

资料来源：据经济企划厅调查。

## 2. 物资被隐藏和生产上人为的开工不足

那么，战后这种悲惨的生产水平是不是由因战火使工厂遭破坏以及因从国外进口粮食、燃料、原材料途径断绝等不可抗拒的力量造成的呢？其实不然。

第一，尽管战后工矿业生产额约降至战前水平的三分之一，但生产设备方面却并非如此。当时的实际情况是，由于战争的狂轰滥炸，主要行业 30—58% 的生产能力遭到破坏，但是由于在战争期间，通过国民省吃俭用以及从海外掠夺进行了强有力的资本积累和增加生产，所以即使扣除狂轰滥炸的重大损失，战败时保存下来的生产设备能力仍比战前水平高。

现在让我们以 1937 年为 100，看看战后保存下来的生产设备能力。纺织产业生产设备能力急剧下降（纺织设备被回炉熔炼作为造炮弹的原料），如棉纺为 19.4，棉纺织机为 31.3。但是作为军需生产主体的重化学工业部门的生产设备能力却远远超过了战前水

平如生铁为 186.7 工作机械为 245.4, 铝为 758.8(第 3 表)。

第 3 表 停战时主要物资生产设备能力

	停战时 A	战时最高 B	1937 年 C	$\frac{A}{B}$ %	$\frac{A}{C}$ %
生铁(万吨)	560	660(1944)	300	84.8	186.7
钢材(万吨)	770	870(1944)	650	88.5	118.4
铝(千吨)	129	127(1944)	17	101.6	758.8
镁(千吨)	4,500	4,400(1944)	1,800	102.3	150.0
石油精炼(千吨)	2,130	4,157(1942)	2,320	51.2	91.8
工作机械(千台)	54	60.1(1940)	22	89.9	245.4
烧碱(千吨)	661	723(1941)	380	91.4	173.9
硫氨(千吨)	1,243	1,979(1941)	1,460	62.8	85.1
氰氨化钙(千吨)	352	356(1941)	450	98.9	78.2
棉纺(千锭)	2,369	13,796(1941)	12,165	17.2	19.4
人造丝(百万磅)	88.6	570(1937)	570	15.5	15.5
人造棉(百万磅)	184	813(1941)	451	22.6	40.7
梳毛(千锭)	375	1,628(1939)	1,549	23.0	24.2
纺毛机	373	733(1940)	684	50.9	54.5
丝线(千锭)	196	463(1938)	462	42.3	42.4
织布机(千台)	113.8	393.3(1940)	362.6	28.9	31.3
毛织机(千台)	9.8	31.8(1940)	29.2	30.8	33.5
丝,人造丝织机(千台)	135.6	343.8(1943)	356.1	39.4	38.0
面粉(千桶)	58.4	?	118.1	—	49.4
罐头(千吨)	228.0	?	84.8	—	268.9
炼乳(千吨)	22.7	?	27.6	—	82.2

资料来源：国民经济研究协会调查，取自有泽广巳稻叶秀三主编《资料·战后 20 年史》第二卷〔经济〕日本评论社，1966 年第 5 页。%为作者计算。

整个产业的情况如下所述：“假定 1935 年生产设备余额为 100，其后由于军需制定了扩充生产能力计划，连年进行了大规模

的设备投资。停战时应为 190。但是其中 30% 因战争灾难和疏散等原因被消耗掉了，战后生产设备余额实际为 140。”（经济企划厅：《昭和 31 年度经济白皮书》第 22—23 页）

第二，生产设备之外的原材料、物资等情况又如何呢？据说由于战争后期运输船只相继被击沉，从海外进口断绝，以石油为代表的许多物资匮乏。但实际情况是当时军部作了持久战的打算，为了确保今后若干年持久的消耗战，在各地的仓库、地下壕沟和山洞中储备了大量的粮食、衣料、燃料、各种原材料等物资。

因此，如果政府和企业大公无私地为社会进行生产的再调整，应该能为国民提供大量物品。当然存在设备老化、零部件短缺，不同行业原材料物资供给的不平衡等恶劣条件。但有了上述数量的保存下来的设备和剩余物资，战后二年生产指数仅为战前水平的 30% 是说不过去的。以战前水平为 100，1946 年的工矿业生产指数为 30.7 即便到了 1947 年也只恢复到 37.4）。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令人绝望的生产瘫痪呢？解开这个谜的关键有以下几点：

第一 庞大的储备物资被军部、官僚、军需资本家、工厂主乘战败混乱之机混水摸鱼地掠夺走、瓜分掉。并且为了销毁证据，有关记录和文件都被烧掉了。这些大量的储备物资被隐藏了起来。据众议院的隐退藏物资特别委员会（委员长是加藤勘十）的报告，仅就该委员会查明的范围来看 投降后的一个月里 由于军队、政府、资本家的沆瀣一气“估计约 5,000 亿日元”的军需物资消失殆尽。这些物资一直深藏于地下，以掩国民之耳目，待他日事态平息后再运用。因此，尽管人们知道有大量的原材料、物资存在于日本列岛的某些地方，但已不能像通常库存原材料和库存产品那样进入正常秩序的社会再生产轨道。

第二，当时大资本家害怕设备被联合国撤走以作为赔偿，或者害怕因人民革命使资本被社会吸收，绞尽脑汁以求对策，并未打算

挺身而出增加生产，以帮助国民克服危机。这时的工厂设备开工率仅为 20—30%。说白了这是来自资本家方面的生产“怠工”行为。这样，大资本家一方面故意抑制生产活动，另一方面零打碎敲地将隐藏物资倒手到黑市交易渠道，以远远高于统制价格的所谓黑市价格出售，牟取投机性暴利。以上这些霸占和隐藏物资以及故意进行的生产“怠工”行为正是战败后一两年毁灭性的生产下降、物资匮乏的主要原因。

另外，当时物资匮乏特别是粮食匮乏方面不容忽视的一点是“黑市”问题。

战后初期日本继续沿用战时的物资和价格统制制度。当时政府的方针是对国民以较低的“公定价格”配给生活必需品。但配给物资数量微乎其微，根本无法满足国民的生活必需。因此在正式配给渠道之外还存在着数量庞大的物资买卖。其中，属自由销售部分之外的被称为“黑市物资”其买卖就是“黑市交易”。黑市物资归根结底来自于如前所述的品质恶劣的军人、官僚、大资本家趁战败混乱之机而霸占的储备物资。这些物资的黑市价格在通货膨胀和投机猖獗的情况下往往被抬高到“公定价格”的数倍或数十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谷物。因为谷物是每天都不可或缺的必需品中的必需品，城市家庭中很少有在购买配给以外（即“黑市”）谷物的。为了得到主食谷物，许多人到农家直接采购。由于农民比起因通货膨胀而急剧贬值的纸币来更加喜欢衣服、肥皂、军用手套、干鱿鱼、干海参等，因此原始的物物交换广泛地出现了。当时只要带去大米、酒、香烟、酱油、食用油等就差不多能换回黑市物资。也就是说必需食品取代纸币发挥了“一般等价物”<sup>①</sup>的作用。可以说

<sup>①</sup>“一般等价物”是衡量用来交换的各种商品价值大小的商品。古代物物交换时代，家畜、皮毛、盐、好看的贝壳等行使了这一职能，后来这一职能被固定在具有美丽坚固、容易加工而贵重的特殊商品即黄金和白银上。这就是货币，纸币是货币流通手段职能的一种替代物。

战败后的日本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倒退到了原始状态。

不过，尽管不购买黑市物资就无法生存，但当时政府仍将黑市交易视为非法。政府一方面对大资本家的大规模黑市交易置若罔闻；另一方面却对农民施加强权压制，动用大批警察取缔基层的黑市小商贩和消费者直接买卖大米。

当时，许多城市居民为了取得价格比黑市价格低的物品，背着背包来到遥远偏僻的农村，直接采购大米、小麦、山芋，警察切断了他们回家的道路，埋伏在车站，以“黑市交易”为借口，强制没收物品，只付给相当于“公定价格”的纸币。这种事件经常发生。由于对所有车站天天执行这种搜索行动，有可能导致暴动，因此警察隔几天执行一次。如果运气不好而碰到了警察的埋伏，从千里迢迢之外运回自家消费的粮食就会被没收。为此而担忧的人们对当时的政治怨声载道。这是因为，当时众所周知，那些发战争横财的人每天都在高级饭店里大吃大喝，饱食终日。由食品引起的怨恨是可怕的。这种“黑市物资”问题充分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社会矛盾，加剧了国民对国家体制的不满和批判。

另外，当时还发生了一起闻名于世的事件。佐贺县出身的法官山口良忠严格地遵守国法，不买一粒黑市大米，结果因营养失调而致死。<sup>①</sup>

作为这一时期粮食问题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军向日本国民发放面粉、玉米面、旧罐头、蛋黄粉等“救援物资”。这对在日本国民之中培植“美国是具有人情味的国家”这一观念，培养日本人的亲美意识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救援物资”有的是通过教会渠道由美国人民直接赠送的，但大部分是沉睡在美国政府仓库中的剩余农产品，例如罐头等，有的是1937年生产的过期产品，在占领地区救济基金（GARIOA）之后，1949年起美国又以占领地区经济复兴基金（EROA）援助名义，对日本提供了剩余小麦和剩余棉花。无论是日本政府还是日本国民，都为这一无偿“赠与”而感激不尽。后来美国声称这些“援助”不是“赠与”而是“借贷”。并告知日本对美国债务达22亿美元（相当于7,920亿日元）之巨。面对惊慌失措的日本政府，美国政府暗示：如果日本加速军备扩张，美国就要考虑“援助”的偿还问题。美国将这一问题作为其要求日本协助美国

### 3. 战后通货膨胀和延期偿付（金融紧急措施）

战后初期，日本人民始终在令人绝望的物资匮乏和史无前例的恶性通货膨胀中苦苦挣扎。自战争伊始，为筹集巨额军费而发行的战时公债像滚雪球似地越滚越大，以至于到 1944 年末公债发行余额超过了当时的国民收入额，战时通货膨胀愈演愈烈。战后尽管战争费用已不复存在，但通货膨胀反而如脱缰之马，一发而不可收拾（1945 年末公债余额为 1,439.7 亿日元）

战后通货膨胀的罪魁祸首在最初阶段是如洪水般发放的“临时军事费”即对接受军需订货企业支付合同金额。“临时军事费”是战时通货膨胀的推动力。既然战争已经结束，当然应该取消这种推动力。然而听命于资产阶级的政府尽管宣布了战败但在战后一段时间内还是支付了 200 亿日元的“临时军事费”直到美军发布停止支付命令的 1946 年 2 月，支付工作才得以终止。据说还有这样的怪事：只是在书面上签订了武器生产合同，后因空袭工厂被烧毁而完全不能生产的无实体企业，政府也对其订货毫不吝啬地支付了定金。

以支付“临时军事费”为契机日本银行券发行余额由 8 月 15 日停战之日的 302.8 亿日元，急剧地增加到第二年 2 月 18 日的 618.24 亿日元，仅半年时间就陡涨 2.4 倍。日本银行券这种洪水般地发行带动了物价的迅速上涨。实际物价水平停战后半年时间内暴涨约为 2 倍。特别是因官方统制制度的破产国民必须购买黑市粮食，因而急剧提高了生活费用（工资只能弥补当时生活费的 40% 左右）。生活费用的不足只能靠挤提银行存款而填补，因此全

对亚洲的政策和阻止日本重新扩军的制肘因素而加以利用。结果，1962 年按当时价格日本对美债务达 4.9 亿美元（相当于 1,964 亿日元）年利规定为 2.5%。分期 15 年偿还。

国银行的储蓄存款(1945年9月末为815亿日元)在半年时间内一下子减少了100亿日元之多。而那些为军需企业提供贷款而又无法收回的银行,不得不以所持有的有价证券作担保,从日本银行借款以维持经营。因此,随着日本银行对民间贷款的激增以及银行担保能力的衰竭,银行经营不善,危机四伏。

正因为如此,1946年2月日本政府突然强制实施了被称为“金融紧急措施令”的冻结存款、停止支付等所谓延期支付措施。其主要内容是:发行新日元,每人只能在100日元限度内以旧日元兑换新日元,国民手中的现金要毫无保留地吸收作为银行存款,并且对以后提取存款设置严格的限制(婚丧嫁娶等1000日元,生活费用一家之主300日元,儿童每人每月100日元),工资也只能用新日元支付500日元以内,超过的部分被强制性冻结为存款。这些数字都是第一次措施令规定的内容,第二次措施令之后,金额有所修改。

这种冻结存款在1946年8月被进一步分割为第一种冻结和第二种冻结。第二种冻结(每个家庭几乎冻结在1万5千日元以上)完全被搁置起来了。它是在当时不得不停止对旧军需公司的“军需补偿”(政府因解除军需合同而给企业带来损失进行补偿)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措施。当时由于切断“军需补偿”,银行对旧军需企业的贷款债权因之难以收回,因而银行发生了亏空,为此政府通过第二种冻结存款方法来弥补银行亏损。这意味着政府以直接牺牲国民部分储蓄存款(第二种冻结)为代价来救济银行。

那么免于冻结而剩下的存款又如何呢?它也通过以下手段,迅速地被贬值。

尽管政府申明封锁存款是旨在抑制通货膨胀不可或缺的措施,但实际上通货膨胀并未得到制止。延期偿付以前日本银行券余额为618亿日元,通过冻结存款压缩到233亿日元(3月),但下个月立即反弹,半年后9月为644亿日元,突破了封锁前的水平,并

且以异乎寻常的速度扩大到第二年的 1 月份超过了 1,000 亿日元。其原因在于：政府以价格差额补助金、各种补助金以及融资等形式将庞大的财政资金用新日元礼物般地送给了大企业。促进通货膨胀的中心机构是“复兴金融公库”(1947 年 3 月开始工作)。“复兴金融公库”的目的是要对煤炭、钢铁、化肥、电力等重点产业部门以超低利率的方式提供设备资金贷款。到复兴金融公库停止融资活动的 1949 年 3 月，其融资余额约为整个金融机构融资余额的 22%，达 1,239 亿日元。特别是仅从设备资金来看，复金的比重就占全部金融机构融资余额的 75% 左右。如此庞大的资金大部分是以发行复金债的方式来筹措的。而这种复金债的 70—80% 又是由日银来承购，通过增发货币来保证资金来源。因此，理所当然地会发生急剧的通货膨胀。这样，政府一方面强制冻结国民血汗结晶的大部分存款；另一方面重新发行巨额的纸币银行券，大手大脚地分给大企业作为资金，从而促进了通货膨胀，结果到后来解除冻结存款时，国民的存款毫无例外地发生了大幅贬值。理应作为老后安居乐业生活保障的银行存款贬值到仅相当于 2—3 个月的实际生活费，不少人对此抱怨不已。与此相反，大资本家却几乎都无偿地积累了庞大的资产。这确实是一种‘合法’的掠夺，是旨在维护大资本家利益的对国民财产的盘剥。

另外围绕‘复金’融资问题甚至还发生了像昭和电子这类大垄断企业与芦田均首相、西尾末广国务大臣之间收受贿赂——金脉事件这样的政治丑闻(昭电事件)。

总之，这一时期的经济政策使发战争横财的大垄断资本家将理由由他们承担的因战败而蒙受的损失转嫁给了国民，而且在牺牲国民利益的基础上，巩固了企业重建和资本积累的体制。广大国民群众在这一时期饱尝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经济贫困、生活困苦的基本原因正在于此。

## 二 战后民主改革

### 1. 民主革命的高涨

战败、无条件投降、外国军队对本土占领这一连串令人震惊的事件，把日本国民推到了激荡的意识变革洪流之中。日本与世界其他国家迥然不同，天皇被视为“现人神”被拥戴为国家元首，日本被称为“神之国”或“神国”“神洲”。战后民主革命将这些国家原则一举击碎。人们都看清了那些专横跋扈、自以为是、独断专行的行为举止。与此同时，铭刻于国民心中的景仰天皇的意识也逐渐开始动摇。当然，深入国民心中的这种景仰天皇的意识是经历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朝代由掌权者们孜孜不倦、毫不松懈的灌输而产生的，所以并非一朝一夕所能消除。但是不将天皇视为神，公然批评天皇制度的人在不断增加。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是，东京世谷居民提出：“我们国民这般忍饥挨饿，要看看天皇家的粮仓。”要求闯入皇宫。

以战败为开端，日本国民的意识变革，价值观念的转变汹涌澎湃地进行。大本营经常公布的战胜了、战胜了、皇军大获全胜等取得如此这般辉煌战果的消息，实际上全是失败。国民以亲身的体会觉察到受了军队、政府以及当权者的欺骗。并且，人们目睹了那些对军队士兵动辄以残酷私刑并傲慢认为只有自己才是爱国者的飞扬跋扈的部分职业军人，趁战败混乱之机以卑劣的手法霸占物资，逃之夭夭的现象，感到义愤填膺。相反，广大国民逐渐意识到，那些以前被冠之谓“国贼”“赤化分子”“污名而入狱的人”才是为国民而牺牲自己的真正爱国者。这样，由于战败而引起的社会、政治、经济的激荡、变革，从根本上动摇了日本人以前的价值观，以至掀起了明治维新以来最大的社会变革和人民革命的高潮。

战后民主主义变革的起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解放势力的全面胜利。作为投降条件，联合国迫使日本接受的《波茨坦公告》在其第六款、第十款中作了如下规定：

“ 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图征服世界之威权及势力，必须永久剔除。盖吾人坚持非将负责穷兵黩武主义驱出世界，则和平安全及正义之新秩序势不可挡。（第六款）

“ 日本政府必须将阻止日本人民民主趋势之复兴及增强之所有障碍予以消除，言论、宗教及思想自由以及对于基本人权之重视必须建立。”（第十款）

总之，其基本精神是铲除日本军国主义和实现民主化，特别是确立言论、信仰、思想的自由以及基本人权。这是结束战争的条件，日本政府无条件接受了。根据《波茨坦公告》的基本精神 首先解散了日本军队。接着，以联合国军队总司令部最初发表的“ 民主改革指令” 的形式，表明了旨在铲除日本军国主义和实行日本民主化改革的具体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 废除治安维持法和国防保安法，立即释放政治犯，废除特高警察，允许自由地批评天皇制度；
- 旨在保护人权的五大改革：解放妇女，培育工会，学校教育自由主义化，废除专制政治，经济民主化；
- 禁止军国主义教育，立即放逐军国主义教员；
- 冻结、解散财阀资产；
- 创设战时利得税和财产税；
- 冻结战时补偿，废除军人抚恤金；
- 解放农民；
- 国家和神道分离；
- 解除军国主义者的公职，解散超国家主义团体；
- 逮捕战争罪犯等等。

其中最有决定性重要意义的是，废除了多年来对抑制日本民

主义和抑压基本人权扮演重要角色的在世界上臭名昭著的恶法——《治安维持法》。同时还废除了挥舞治安维持法这根大棒镇压人民运动的执行者——特高警察。并且释放了根据臭名远扬的《治安维持法》而被逮捕、入狱的所有政治犯。说得极端一些，只有废除了《治安维持法》，日本的战后史才真正开始。

这样，在掌握权力的占领军自上而下发布民主化指令的有利形势下，日本的民主势力迅速壮大。工会、农会、青年组织以及学生自治会等大众组织如燎原之火迅速扩张。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工会的诞生，战后满一年时（1946年8月末）加入工会的会员数已达393.7万人，入会率达30%。如果考虑到战前最高水平分别只是36.9万人、7.9%（1931年数字）的话，显而易见，战后工会发展是何等地迅猛。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战前和战时依据《治安维持法》受到残酷镇压的日本共产党，在历史上首次作为合法政党在大众面前公开展示自己。根据1945年10月4日发布的《政治犯释放令》而获得自由的日共主要成员，立即以旺盛的精力展开活动，对大众斗争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

这样，急剧发展的人民运动与妄图维持旧体制的统治势力进行了殊死的斗争，使许多民主主义变革取得了成功。其中以下几项改革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 (1) 终止了与神化天皇相伴的绝对天皇制，确立了主权在民的原则；
- (2) 在解决国际争端上，明确提出了放弃武力的原则；
- (3) 确立了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以及男女同权等基本人权；
- (4) 承认确保工人的团结权、团体交涉权以及罢工的权利；
- (5) 废除了农业寄生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度，清除了各种封建性社会关系的残余（《新宪法》1947年5月3日执行；《工会法》

1946年3月1日执行；《农地改革》方面，1946年10月11日修正了《农地调整法》（1949年3月改革完毕）。

当然，这些改革由于日本保守势力的顽强抵抗以及美军的干预，包含了许多不彻底的内容。特别是关于天皇制问题，提出了“天皇是国民的象征”的见解，保留了天皇的许多特权。但是从总体上来看，这些改革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可以说，它继承和实现了明治维新时期应尽而未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性任务。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日本国民来说是带来巨大牺牲的不幸事件，但历史并不只是单纯地制造不幸，祸兮福倚，正是经历了这场战争，日本才完成了明治维新后近80年时间里想完成而未能完成的进步性社会变革，实现了从具有浓厚半封建性残余的社会向大幅度承认民主主义和自由的近代社会的飞跃。

## 2. 垄断资本主义解体的危机

诚然，民主主义革命浪潮并不只是针对封建制的残余（天皇制、寄生地主土地所有制），它也将矛头指向了统治资本主义经济的财阀、垄断资本。

如果只从军阀的追功逐利和狂妄的征服欲来说明日本在亚太地区发动侵略战争的原因那是非常浅薄的。日本经济组织特别是日本垄断资本主义为了获得最大限度利润，要求重新分割（全面统治亚太市场才是这场战争最深刻的根源。正如以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吞并朝鲜、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利品（包括领土、权益、赔款等等）作为特殊的积累源泉，使日本初期垄断资本富裕起来一样，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侵略战争，日本垄断资本实际上获得了巨大的利益。

日本垄断大企业战时获取的巨大利益，首先是从海外被占领地中掠夺的。就是说，“皇军”一旦占领外国领土，日本企业就立即进入其占领地区，迫使当地居民进入矿山和工厂，在与俘虏同

样恶劣的劳动条件下，驱使他们从事长时间的劳役。另外，日本企业还在占领地区建立开发公司、收购公司，以低廉价格掠夺性地从农民手中征收农产品等等，把战时在殖民地攫取的超额利润积累起来。

在日本国内以“战时统制经济”的名义，国家经济在强权性国家统制下全面地进行了调整。建立了各种“统制会”、“营团”、“公社”、“金库”、“国策公司”这些垄断大企业和军需公司通过资金统制、物资统制、劳务统制，垄断了资金、物资和劳动力。无数中小企业被整顿、合并和解散，在国家权力的直接保护下，大企业强制实现了资本的积聚和集中。

工会、农会以及其他所有的自主性大众团体，遭到了彻底的镇压，取而代之的是，成立了“产业报国会”之类的右翼劳动组织；工人所有合法的团结权、罢工权被剥夺，在“产业战士”的幌子下，工人被束缚在苛刻的劳动条件下和低工资上；工厂成为兵营的延长线，被置于宪兵的监督之下。资本的剩余价值率跳跃性增大。

在此基础上，军部政府以支付巨额“补助金”、“补偿金”以及对“特殊公司”出资贷款、支付补贴等方式，向垄断资本如潮水般地注入国库资金。不言而喻，这种资金注入的最直接和最大的手段是“军需订货”。

军需订货是以超常的特惠价格进行的。例如海军经理部委托某军需公司承制曲射步兵榴榴弹，据说“在陆军兵工厂制造只需五日元七八十钱，可是他们以近四倍的价格 22 日元 签订了合同”，“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井上晴丸、宇佐美诚次郎：《危机中的日本资本主义结构》1951年 岩波书店 第 127 页），另外，通过军需生产而使企业大捞一把的最妙手段是，订购远远超过各企业生产能力数量的军需品，以及对所订购的军需品毫不吝啬地提前支付预

付款。

政府对军需工业企业支付的预付款急剧增大，“仅三菱工业一家在战败以前的预收款就达 130 亿日元（同上书）”

这样，日本垄断大企业通过这场战争攫取了平时无法想象的巨额超额利润。确实，“战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对工人来说是军事地狱，对资本家来说则是天堂”（列宁语）。

诚然，表面来看，战争的策划者是军阀，但真正的始作俑者是隐藏在军阀背后获取最大利益的财阀即垄断资本。财阀利用军阀积累资本。如果对《波茨坦公告》——“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图征服世界之威权及势力，必须永久剔除”——的规定从其根本精神来理解的话，不仅应该将军阀和战犯革职，瓦解军队和特高警察，解散超国家主义的右翼团体，而且还应该进一步做到改革废除垄断资本主义这种经济组织。

另外，在像停战后发生濒临饿死人的物资匮乏的背景下，大企业隐藏大量战时储备物资和人为地制造生产“总工”，成为国民怨恨的焦点。“揭发隐匿物资的斗争”和劳动者以实力对抗生产“总工”的“生产管理斗争”迅速展开。还有通过延期支付和复金通货膨胀的伎俩，大企业和金融资本对大众进行了残酷的盘剥，这些都激起了国民的义愤。战败初期经济生活中的激烈变动如同森林中动物的弱肉强食，国民通过亲身体会，逐渐认清了大垄断资本反社会的本性。

因此，为了克服这种深刻的经济危机，无论如何也有必要对垄

例如，昭和18年（1943年—译者注）4月，军需省航空兵器总局对兴东特殊工业公司发出了50辆燃料汽车的订货，并支付了43万余日元的预付款，然而只收到了一辆汽车。尽管如此，接着又在11月、12月和1944年10月分别缔结了500辆、220辆以及160辆共计880辆的购入合同，并支付了总计413万日元的预付款，分别相当于合同定金的三分之二到十分之八，但结果均未收到，直到战争结束时，总共也只不过收到了31辆（同上书第127页）。